

RCEP 生效对中国、东盟和印尼经贸合作的影响



Harryanto Aryodiguno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以下缩写为RCEP),是2011年由当时还是东南亚国家联盟(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成员国的印尼提出的。这一倡议是对几个自由贸易协定(FTA)成员国提出的建议的回应。特别是中国和日本。中国和日本希望东盟国家形成一个自由贸易区。自由贸易区将成为所有成员国进行自由贸易对话的渠道。例如,中国希望东盟与中国、日本和韩国建立一个自由贸易协定的对话伙伴。但是,当时日本提出的自由贸易协定(FTA)涉及了中国、日本、韩国、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等所有自由贸易协定(FTA)对话伙伴。因此,中国和本国的提案开启了RCEP正式谈判。因此,2012年11月至2013年5月,召开了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经济技术合作、知识产权、竞争政策、争端解决等问题的会议,主要讨论取消关税和非关税壁垒。

建立RCEP是为了整合现有东盟加一的自由贸易区。然而,与其他成员国讨论更新自由贸易规则,例如,如何规范商业服务、贸易、旅游服务等问题,目的在于统一整个亚太地区的贸易规则。RCEP的结束旨在整合亚太地区现有的经济和贸易协定,整合亚太地区国家的最终目标是希望建立类似欧美的区域一体化。为实现成员国的预期目标,RCEP制定了若干自由贸易区原则,如:强调东盟共同体,强化东盟谈判的核心组织地位;遵守世贸组织规范,避免其他国家的商品被排斥进入本国市场和形成区域壁垒的情形;在现有东盟与中国、日本、韩国、印度、新西兰、澳大利亚5个成员国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和扩大贸易自由化程度;谈判过程要灵活,要降低谈判门槛;给予东盟低发展的国家特殊和差别待遇;在RCEP磋商完成后,允许未参与RCEP谈判的国家或经济体完成磋商后加入RCEP。

RCEP 经贸实力

2020年11月15日,由成员国的经济贸易部长在各国政府首脑见证下签署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尽管RCEP是通过远程或互联网签署的,但面对全球经济面临衰退和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东盟成员国及其对话伙伴已顺利完成了为期8年的RCEP谈判和承诺。《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签署向国际关系发出了一个信号,即“东盟国家和伙伴”正在积极努力,致力于寻求和解决世界经济复苏问题。这一历史事件也发出了一个信息,即

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和经济关系将继续发展。就2012年《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谈判的指导原则和目标达成一致。2013年至2019年11月进行多次谈判以来,RCEP参加国已达16个。然而,印度在2019年11月决定退出RCEP,当时谈判已进入最后完成阶段。最终,RCEP 15个成员国同意继续未完成的谈判,希望印度未来仍有兴趣重新加入RCEP。即使印度不加入,RCEP仍然是一个世界上最大的和最具有影响力的贸易协议,因为根据国际关系权力转移理论的其中一点指出美国与新兴强国中国之间的权力角逐会影响亚太的经济贸易发展。因此,RCEP的存在可以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全面进展协定》(CPTPP)和《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相平衡,之后世界经济的偏好和决定不再由西方决定。此外,RCEP地区人口约占世界的30%,GDP约占世界的30%,贸易约占世界的27%,外国直接投资(FDI)约占世界的29%。东盟学者当时指出,到2021年,RCEP协议需要至少6个东盟成员国和3个贸易伙伴向东盟秘书长提交申请和批准文件,才能正式实施。自2022年1月1日起,东盟六国(文莱、新加坡、柬埔寨、老挝、泰国、越南)以及中国、日本、新西兰、澳大利亚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正式生效。韩国等其他成员国也将在完成国内批准程序后生效。

中国-东盟经贸合作

有学者用新自由主义的视角来解释东亚或东盟国家

关系的前景。国际关系中的新自由主义强调国家是行动者。其理念是,参与者必须遵循全球化而行。全球化的其中一个条件是经济自由化。新自由主义认为,以经济自由化为特征的全球化是一个创造“休斯游戏”(Positive Sume Game)的过程。这意味着所有行动者都有机会从经济全球化中受益,前提是行动者或国家能够提高其在全球舞台和贸易中的竞争力。

新自由主义努力恢复市场的信任,并通过自由贸易建立一个强大的市场。自由贸易是一种经济概念,指的是国家之间以减税、甚至不征税或不设置贸易壁垒的方式相互出售产品。新自由主义者认为,经济增长是自由竞争的正当结果,自由竞争是因为自由市场的存在。对于新自由主义来说,自由贸易是一种经济优势和现实和平的方式。由于自由贸易带来了互利合作,它增加了国家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合作关系,从而减少了冲突的可能性。学者用新自由主义来看待国际合作。基本的假设是,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单独满足自己的需求。特别是在促进国内发展和提高国际地位方面。此外,由于每个国家的需要是相互依存的,国际合作是不可避免的形式进行,然后由有关国家通过其国家立法对外宣布协定的生效。

RCEP是过去十年来东亚贸易政策框架演变的重要一步。RCEP的形成似乎是在重复几年前的现象。从东盟与中国、日本和韩国之间的自由

贸易协定(即东盟+3)的形成过程开始。RCEP也可以说是一种通过确保成员国市场保持开放和公平竞争环境来保持地区增长的战略。考虑到自贸协定伙伴和地区的多样性,RCEP谈判非常繁琐和复杂。但16个国家的领导人都有信心迎接挑战。对于该地区的领导人来说,区域合作是现实与希望之间的一种选择,即国际无政府状态(目前的现实)和全球一体化(未来的希望)。他们认为,如果与一个地区的国家有密切的文化、经济、政治和地理联系,再加上每个国家参与该组织,将减少或避免地区大国的出现。

从新自由主义的角度分析来看,RCEP主要是促进区域经济发展,使参与国实现互利共赢。实际的共赢就是建立统一的区域原产地累加规则,有利于提高RCEP成员国区域产业链分工的效益,是一个切实可行的双赢。以前,每个国家都有不一致的贸易规则。例如,中国企业生产的手续在与韩国的FTA中享有特惠关税,但是有可能由于有些手机组合的零件进口源不符合日本的自贸协定的标准,而无法在出口日本时享受关税优惠。未来贸易中间产品可以来自任何一个RCEP国家,这有利于区域内的产业链分工。

以上的例子表明,新自由主义认为要达成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就是要开放公平的竞争,也就是开放自由市场。这个经济概念在其发展之初是指在国家之间销售产品,减少甚至没有税收或贸易壁垒。但随着全球经济的发展,

这里的自由不仅在货物贸易方面发展,还包括服务贸易、投资、经济合作、知识产权等。以新自由主义视角为特征的经济自由化允许自由贸易的所有参与者在国家或行为体能够提高其在全球舞台和贸易中的竞争力的条件下受益。学者认为从中国的角度出发,中国参与RCEP的收益多。其中之一是改善东亚地区的政治经济状况。中国以RCEP为平台,搭建和解决东亚冲突的桥梁。随着这些东亚国家在RCEP中形成合作,这将使东亚发生的政治经济状况发生更好的变化。

关于RCEP对印尼经济影响的研究建议,印尼应立即准备并实施政策或结构调整,以便在未来充分利用RCEP带来的机遇。印尼政府非常清楚,成功利用RCEP机会促进印尼经济发展的关键是提高该国的竞争力,这就影响了现有民族产业的竞争力和投资环境的吸引力,从而吸引对数字导向产业的投资,促进产业革命。

这一步骤除了非常一致外,还是长期复苏努力的引擎,必须认真、明智、全面和可持续地进行。这场COVID-19大流行必须成为印度尼西亚的一个转折点,这样,未来的经济复苏措施才能成为支持可持续经济增长的步骤,从而使印度尼西亚的经济水平更好。

作者系印尼总统大学(President University)国际关系学系助理教授及总统大学专业教育发展中心主任,中文名:赖剑文。

椰風置雨

本报评论员:余凡

近两个月来,西瓜哇省某习经院的年轻院长兼讲师某BS,因殴打犯法被拘获释不久,即在全国舆论场上兴风作浪。他指责温和派老无作为,挑动激进派为被政府判刑的非法“阵线”前领导HRS作抗争;向政府要员、军方领导、爱国开明人士发出居心叵测、充斥仇恨的言论。分析称BS企图取代HRS成为激进派领袖,而他显然获得不少支持。

去年12月29日,西瓜哇省警察厅在有人控告并依法调查后表明,已将牵涉BS的案件进一步提高为“调查”级别。BS将被控以涉嫌散布虚假信息,挑拨种族、宗教、群体(SARA)间的敌对或仇恨情绪。违反了“电子讯息法”

国警依法处理“仇恨言论”

及1946年第1号第15条宪法。

这期间,西瓜哇省军区司令员亲自到BS的住处造访,在对话中建议BS对他所发表的“仇恨言论”以及讽刺陆军总司令的“不当言论”公开道歉。但在BS团伙所摄制并大量传发的视频中,军方合情合理的意见却被故意扭曲了。此外,还风传BS住处被人抛下“三个狗头”的“恐吓性”行为。但有分析说,这些都是BS一伙导演的“苦肉计”。

《呼声网》(Suara.com)于1月2日报道,西瓜哇省警察厅的调查员在侦办BS蕴含SARA敏感话题的“仇恨言论”案件时,没收了至少6件证物。警察总局公关厅宣传科长拉玛丹(Ahmad Ramadhan)将表示:“所有警方搜集到涉案的数字化(digital)证

据,已寄往警察总局刑侦科(Bareskrim)的法医(Forensik)数字化实验室进行深入的调查。”

之前没收的证物包括1台笔记本电脑(laptop),一个YouTube账号(akun),一个名为smktp49@gmail.com的邮箱。而新增增加的物证是牙律(Garut)案发现场(klaster TKP)的一部手机,以及万隆(Bandung)市犯案现场的一个内存驱动器(flashdisk)。

随着侦办这“仇恨言论”案件的继续深入,警方调查及询问的证人以从初时的34人猛增至目前的50位证人。拉玛丹将说明,为了便于区分鉴别证人们的身份和工作,警方将BS发表“仇恨言论”的万隆市定为第一案发现场,有关联的证人共15位。而牙律为第二现场,有10名知情者被指定为证

人。此外,到警察局报案的4人被定为原告证人,还有21名学者被警方邀请成为中立的专业证人(saksi ahli),以便案件能公正地审理。

针对BS的一系列“仇恨言论”,警方将继续深入调查,并传唤更多证人以提供更充足而有力的证据,需要时以专业并根据科学犯罪调查 scientific crime investigation 的方法征求专家的意见。警方已传唤作为被告的BS于1月3日到警局接受询问。

媒体报道,BS于周一在法律顾问及数十名支持者的拥簇下,浩浩荡荡的到西瓜哇省警察厅接受询问,从中午一直被轮番调查至深夜,在刑侦处待了至少10个小时。

《罗盘网》(KOMPAS.com)于1月4日报道,BS于当天被警方拘捕的消息迅速

传开,在国内引起热烈的争论,为警方“加油点赞”的为数甚众。警察总局公关厅宣传科长拉玛丹将向媒体公开西瓜哇省警察厅对嫌犯BS采取直接拘押手段的两个理由:“主观的原因是调查员担心BS及TR又再重犯刑事案,以及有可能消除之前犯案的相关证据。”

警方已将BS及另一名同犯TR控以散播虚假信息并定为疑犯,警方除了根据“主观评估”,也依据客观的执法权力对上述两人采取马上扣押拘禁的措施。因为他们所违反的是1946年第1号第14条与第15条的刑事法(Hukum Pidana),可能被处以5年以上的监禁。因属于较重的刑法,允许警方对案犯立即拘捕。网上也贴满了民众对执法部门的支持。

作为BS的法律顾问,伊

克万(Ichwan Tuankotta)周二向媒体表示,警方的扣押行动过于紧迫,“针对BS的法律程序那么急促,从发出‘调查通知’(SPDP)仅2天就被传唤,而今天即被定为案犯并马上拘捕。”语气中蕴含对警方执法的不满和怨愤。

这两天在《第一电视》(TV One)的论坛上,对BS被警方刑拘的看法,代表正反两方的4名嘉宾进行了激烈的争辩,网上也是议论纷纷。BS的支持者认为警方“双标”,有数位亲政府公知被反对派提告,但警方讯问都没有进一步扣押,与BS的遭遇有天渊之别。

不过,很多宗教长老、专家学者呼吁大家要小心国家警察,不要以自己及团体的意愿强迫警方让步。警方接案后,还需经过检察院审查,由法院判决,国家法律应该被尊重。面对不宽容(Intoleran)的激进主义,挑拨离间的“仇恨言论”,不能再放任或漠视了!



陈岳全(达当·克里斯丹多 Dadang Christanto)

达当·克里斯丹多:重塑自我

达当·克里斯丹多(Dadang Christanto)于1957年出生在中爪哇直葛市格曼特兰村(Kemantran, Tegal),当时叫陈岳全(Tan Gak Tjwan),在家中五兄弟中排行老四。父亲叫陈益洲(Tan Ek Tjioe),母亲叫邱薇娇(Tjioe Wie Kiauw)(后更名为尤莉妮 Yuliani)。他们家是村里唯一一个华裔家

庭。

1966年,达当还不到10岁,就离开了故乡,被母亲寄养在万隆的姑姑家。为了响应将华文姓名改为印尼名字的规定(编者新注:其实不是规定,而是呼吁),小达当苦思冥想,为自己琢磨出了一个新名字。他把他所知道的、具有巽他特色的名字“达当(Dadang)”与他在明谷学校(Sekolah Minggu)所知道的、受人欢迎的名字即“克里斯(Chris)”合在一起。此外,他还觉得有必要冠上他的姓氏“陈(Tan)”,又加了一个后缀“to(多)”。就这样,陈岳全改名为达当·克里斯丹多。

达当·克里斯丹多在印尼美术学校(SSRI)(现为美术学院)接受艺术教育。在日惹,他加入了竹子初级工作坊(Pawiyatan Sanggar Bambu)并积极参与活动。他与日惹总部的伦德拉剧院人员来往密切,学习到了舞台艺术中肢

七十年代后的华人艺术家(3)

亨德罗·威彦托(HENDRO WIYANTO)

体动作的基本技巧,而这些戏剧技巧后来发展成为肢体语言,融入到他部分展示作品当中,比如《我是人类》(1992)、《为了那些被屠杀的人》(1993)、《地球人》(1994)和《五月之火》(1999)。

达当从印尼艺术学院毕业后,对罗莫·Y.B.曼昆维佳亚(Romo Y.B.Mangunwijaya)的《科德河畔居民发展项目》产生了兴趣,在那个边缘环境里做了长达一年多的志愿者。此外,他还加入了日惹新城(Kotabaru)天主教中心的视听工作室(SAV)艺术家团队。在他的其中一部作品就是以圣经故事为背景的喜剧。

90年代末,他积极参与日惹大学的各种研讨活动。在这些活动中,他意外结识了一位专门研究人民文

协(Lekra)作品的印尼文化研究员基思·福尔彻(Keith Foulcher)。基思后来邀请达当于1991年前往澳大利亚阿德莱德的弗林德斯大学(Flinders University)举办展览。达当没有浪费这次机会,离开天主教中心,成为了一名艺术家。

达当凭一些批判新秩序时期暴力和野蛮主义的作品,在印尼尤其是美术圈里开始小有名气。1966年,在他格曼特兰的家中发生了一件事,而对这件事的模糊记忆一直是他抨击时事的动力所在。一天清晨,当所有的孩子还在熟睡之中,他的父亲被一帮军人“接走”。从此,杳无音信。当年父亲只有40来岁。

达当叙述了他过往经历

中的一段阴影:

“60年代,我记得村里当时有许多活动。每当听到安索青年组织(Pemuda Ansor)或者穆罕默迪亚(Muhammadiyah)青年组织的鼓乐声,我们都会兴高采烈地从家里跑到路上。狂欢游行之前,他们会在房子前面的空地上集合。如果人民青年团或人民文协晚上有文艺活动,他们也会把那块空地作为活动地点。”

“一天晚上,我们家来了许多人,原来他们把我们家当作人民文协艺术家们的聚点。那天晚上,他们准备在我们房前的空地上举行文艺演出。一直到现在,我都不太明白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人民文协的人会选择我们家作为聚点?我母亲说,我的父亲是一个不懂政治的人,也

从来没有加入过印尼共产党……”

“当时我住在农村,只有8岁。我什么都不懂,我只知道……一大早(我的父亲)就被带走了。我们五个人还在睡觉。最年长的哥哥12岁,我的弟弟3岁。从此,我再也没有见过我的父亲。”(采访,2002年4月4日)

与父亲在一起的最后记忆,是在这个不吉祥的日子之前的几天。陈益洲的妻子要他骑车带着儿子去看一下父母的坟地。由于大雨接连下了两天,他们的母亲尤莉妮担心新墓的土会坍塌。达当看到他的父亲埋头清理坟墓旁边的积水,然后重新堆上土,以方便辨认。原来,父亲到爷爷坟前祭奠竟然预示着他的父亲将永远离开他们。这就是达当对父亲的最后一抹记忆。

(原载《华人在印尼民族建设中的角色和贡献(第二册)》。本篇未完待续)